

臺灣民衆在選舉期間與選後對政黨厭惡感的變動：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的比較*

蕭怡靖**

摘要

臺灣自 2000 年起，藍綠政黨間的競爭衝突不斷，激起民衆在黨性上的情感對立。其中，公職人員選舉是政黨競爭最重要的場域，政黨及候選人爲求勝選，會採取各種競選策略，並透過媒體及人際網絡進行宣傳與動員。而民衆對敵我政黨的情感對立是否因此被激化？尤其是否提升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爲此，本文以臺灣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爲背景，利用定群追蹤的民意調查方式，檢測民衆在政治競選期間與選舉結束後，對政黨厭惡感的變化。研究發現，中央層級的總統選舉確實會激化民衆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但在地方層級的縣市長選舉則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果。而對政黨厭惡感的激化，主要是受到競選期間重大議題與事件的影響，包括對兩岸統獨及罷免韓國瑜的態度。

關鍵詞：政黨厭惡感、政治競選、情感極化、總統選舉、定群追蹤

* 本文援用 2018 年電話訪問資料係與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劉從葦副教授，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黃信豪教授合作執行；2020 年電話訪問資料則由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王靖興教授慷慨提供。作者由衷感謝上述學者的協助與資料提供，更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專業具體的修正建議，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系教授，電子郵件：yching@nccu.edu.tw。

壹、前言

毫無疑問的，選舉是民主體制最重要的運作模式，民衆透過選舉，決定由哪個人或哪個政黨來組成政府，也透過選舉決定重大政策的方向，選舉已成為主權在民的重要表徵。也因此，競選期間，政黨及候選人在以勝選為主要考量的前提下，勢必透過各種選戰策略向選民提出訴求，打動選民的心，爭取選民的認同及手中選票的支持。至於政黨或候選人採取的競選活動，是否能夠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學界雖已進行相當長時間的研究，但迄今仍未獲得一致的結論。應該更彈性的說，競選是否有效果，必須視影響的面向、對象，以及不同選舉的環境系絡而定（Schmitt-Beck & Farrell, 2002）。不過，政治競選對民衆的影響，並非僅止於投票當下的抉擇，畢竟投票抉擇是立基於選民在投票前所形塑的政治態度，由態度決定行為。而在競選期間，若政黨或候選人的競選策略，採取相對激情的情感對立來爭取選民認同，選民自然容易受其影響，形塑出對立的情緒態度。

在臺灣，雖然政黨或候選人在選舉期間的競選策略，多同時兼顧政策政績的訴求以及情感認同的動員，但卻可以明顯感受到，臺灣的政治運作已形塑出以國民黨及民進黨為主的藍綠對立。尤其，只要牽涉到兩岸互動的任何議題，幾乎都會挑起兩黨之間的高度衝突，甚至與兩岸事務無關的議題，也出現嚴重的對立。例如民進黨二次執政後，在公教年金改革、勞工一例一休、前瞻基礎建設、不當黨產、促轉條例、美豬進口及新冠肺炎疫苗採購等議題上，皆與國民黨存在嚴重的歧見。而這種藍綠對立，不但存在政治菁英於國會法案審查上的激烈攻防（黃秀端，2004；盛杏媛，2008），也可能因為競選動員及媒體傳播的效應，逐漸蔓延至群眾間的黨性情感對立。

過去的研究已發現，隨著臺灣政黨競爭日趨激烈，國、民兩黨支持者的情感對立逐漸拉大，不僅與美國當今的政治運作一樣，出現以黨性為基礎的「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更重要的是，這種情感極化皆是源自對敵對政黨厭惡感的增加，而不是對所屬政黨好感度的提升（Abramowitz & Webster, 2016; Iyengar et al., 2012, 2019; Iyengar & Westwood, 2015; Yu & Hsiao, 2021; 李弘繹、張佑宗，2022）。至於之所以出現情感極化，學者間的研究多指向選舉期間政黨及候選人採取負面競選，再加上傳播媒體的報導煽動所致（Lelkes et al., 2017; Levendusky & Malhotra, 2016a; Sood & Iyengar, 2016; Rogowski & Sutherland, 2016; Webster & Abramowitz, 2017），甚至擔心會因此影響民衆對民主政治運作的信心（Hsiao & Yu, 2020; Somer & McCoy, 2018; McCoy et al., 2018; 蕭怡靖，2019）。

近年相關研究即證實，在競選期間隨著投票日的接近，民眾對敵我候選人或政黨的情感好惡逐漸擴大，強化情感極化的結果（Bassan-Nygate & Weiss, 2022; Hansen & Kosiara-Pedersen, 2017; Rodríguez et al., 2022; Singh & Thornton, 2024），並在選舉結束後開始消退（Hernandez et al., 2021）。雖然上述文獻呈現出在不同憲政體制下的差異，但對於不同公職人員選舉層級的影響（例如地方縣市長選舉與中央總統選舉的差異），以及選戰氛圍或事件的干擾（例如 2020 年總統選舉期間同時進行罷免韓國瑜的活動），則未獲得充分的討論。對此，本文在填補上述缺口的考量下，以臺灣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為背景進行分析比較，透過「定群追蹤」（panel study）的民意調查資料，針對同一群民眾在競選期間及選戰結束後進行資料蒐集，測量其對國、民兩黨厭惡感在前後兩次的變化，以及不同選舉層級的差異，並探索導致態度變化的因素，以回答並驗證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及研究假設。在章節安排上，次節針對政治競選與政黨厭惡感的關聯進行文獻評析；第參節討論 2018 年與 2020 年兩次選舉的選戰氛圍，並依據學理論述提出研究假設；第肆節說明資料來源與變數測量方式；第伍節則進行資料分析與結果詮釋；第陸節為結論。

貳、政治競選與政黨厭惡感

競選期間，政黨與候選人無不透過各種形式的人際動員、資訊傳播及議題操作等策略爭取選民的選票支持，但於此同時，是否會激化民眾對所屬政黨與敵對政黨的情感對立？這一部分可從美國自 1980 年代開始，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競爭日趨激烈，「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頓時成為熱門的研究主題說起。早先學者從「自由－保守」意識形態的光譜分布，探討美國民眾的政治立場是否出現兩極化態勢，但因為對極化定義的分歧與測量方式的不同，學者間存在高度爭辯，並未獲得一致的共識（Abramowitz, 2010, 2011; Abramowitz & Saunders, 2008; Fiorina & Abrams, 2009, 2011; Fiorina & Levendusky, 2006; Fiorina et al., 2006, 2008）。

此時，部分學者另闢蹊徑，從民眾政黨認同的心理層面切入，發現美國民眾對兩黨的情感好惡愈趨明顯（Hetherington, 2009, 2011），也會依循自己的黨性對政策作出評價（Kimball & Gross, 2007）。其後，Iyengar 等人（2012）引用 Tajfel 與 Turner（1986）所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認為政黨支持者會產生「我群對他群的心理」（us-versus-them mentality），過度讚揚所

屬政黨，同時貶抑敵對政黨，並利用長期民意調查資料，證實美國民眾對所屬政黨與敵對政黨的情感好惡差距逐年拉大，並將這種黨性愈趨對立的現象稱之為情感極化。尤其發現民眾的情感極化主要存在於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明顯提升，但對所屬政黨的喜好則沒有明顯的變化。

因此，近年來學界的研究焦點從過去傳統的政黨認同，轉移至民眾是否對特定政黨存在負面心理態度的「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或「負面政黨認同」（nega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即便 Lee 等人（2022）認為負面黨性有被誇大之嫌，因為其研究顯示多數美國民眾的黨性仍舊是正面多於負面，或是兩者相差無幾。但許多學者仍提出各種不同的測量方式，也檢視對民眾政治態度或政治行為的影響，皆證實負面黨性與政黨認同雖然有相關，但確實屬於兩個不同的概念（Abramowitz & Webster, 2016; Bankert, 2021, 2022a; Caruana et al., 2015; McGregor et al., 2015; Medeiros & Noël, 2014; Ridge, 2022; Walder & Strijbis, 2022; 李弘繹、張佑宗，2022；莊淑媚、洪永泰，2011）。

至於民眾為何會形塑負面黨性的心理，學者提出許多不同的解釋，除了可從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來解釋外（Abramowitz & Webster, 2018; Bankert, 2022b; Webster, 2018），民眾的資訊接收、人際互動與所處的系絡環境更是無法忽略的要素。例如國家的選舉系絡，包括個人選票、有效政黨數及是否採行同時選舉，皆與該國民眾的負面黨性比例有顯著的差異（Anderson et al., 2022）。Iyengar 等人（2019）在探討美國民眾情感極化的起源與成因時，綜整出下列四項因素，亦可作為形塑負面黨性的原因，同時也受到後續研究的證實。

首先，民眾意識形態的「政黨歸類」（party sorting）愈來愈明顯、「立場交錯」（cross-cutting）的機會愈來愈少，導致對敵我政黨支持者的立場認知愈來愈兩極，甚至錯誤的認知敵對政黨及其支持者的立場更極端（Huang & Kuo, 2022; Levendusky & Malhotra, 2016b; Mason, 2015），進而提升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情感。其次，高度選擇的媒體環境及具黨性立場的新聞平臺擴增，激起民眾對政黨的認同與心理情緒（Lelkes et al., 2017），以致強化對敵對政黨的負面情緒。再者，民眾線上與線下的人際網絡愈來愈同質，接收到的訊息與自己立場偏好愈趨一致，在「同溫層」（echo chambers）的環境下，對敵對政黨的 psychological 情感也愈趨負面（Lee et al., 2022; Yarchi et al., 2020）。最後，也是本文最關注的，即是政治競選的影響，在競選期間，政黨及候選人採取衝突對立的競選策略，不僅強化政黨支持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提高對敵我政黨的情感極化。

Sood 與 Iyengar（2016）的研究即證實，在競選期間愈接近投票日，民眾對

所屬政黨與敵對政黨候選人的情感愈趨兩極化，甚至在投票前的情感極化程度比投票前一年高出 50% 至 150%。這主要是因為愈來愈尖銳攻擊的競選過程，讓民眾暴露在以負面競選為主的環境中，再加上政黨及候選人的高度動員，會加重民眾對黨性的依附情感，不僅強化對政黨既有的刻板印象，也產生新的刻板印象，讓有黨性的民眾對敵對政黨的評價愈來愈負面。例如：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利用種族與族群間的敵視來吸引勞工白人的選票支持，同時排除許多高等教育白人及多數非白人的選民支持，其競選語言存在明顯的極化與「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將整個國家分裂為「我們」與「他們」，讓民眾的負面黨性增高，也促使選民基於對敵對政黨及候選人的敵意作出投票決定（Abramowitz & McCoy, 2019）。

Singh 與 Thornton（2024）也利用美國自 1980 年以來，歷次總統選舉在競選期間所進行的多筆民意調查資料（包括定群追蹤與橫斷面調查），同樣證實愈接近投票日，民眾對候選人的情感極化確實愈來愈強化，尤其是對敵對政黨候選人的厭惡感明顯上升，但是對政黨的情感極化則沒有顯著的增強。之所以如此，作者認為是因為民眾對政黨的立場認知相當穩定，但對候選人相對陌生，故在競選期間逐漸瞭解候選人的立場與人格特質，進行形塑出對候選人敵我態度的差距。另外，也可能是因為憲政體制的關係，因為在總統制國家強調總統及候選人的個人色彩，反觀在內閣制國家，則相對聚焦在政黨競爭，因此容易在競選期間強化民眾對政黨的情感極化，這在採行內閣制的丹麥、西班牙、以色列等國中皆獲得證實（Bassan-Nygate & Weiss, 2022; Hansen & Kosiara-Pedersen, 2017; Rodríguez et al., 2022）。至於臺灣不僅為半總統制，且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同時舉行，又國會選舉採取混合選制，有超過三成的席次由政黨票決定，故政黨在競選期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表示民眾對政黨的情感極化很可能在競選期間被強化。

Cassese（2020, 2021）從社會心理學中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檢視美國 2016 年總統選舉期間媒體的新聞報導內容及民眾的政治態度。所謂的去人性化是指不論個人或團體，在對人的認知或對待的行為表現上，彷彿不將其當作完整的人，是一種對人性的否定。其研究發現，競選期間候選人的煽動性言語存在幾種共通性的去人性化類型，且具黨性的民眾也會以隱約或公然的方式對敵對候選人去人性化。例如：批評敵對政黨候選人不是現代人類。而此一態度一旦形塑，不僅會擴大與政治對手的社會距離，也會削弱「人際間的容忍性」（interpersonal tolerance）。Reiter 與 Matthes（2022）的研究甚至發現，這種「骯髒競選」（dirty campaign）已涉及違反社會規範及自由民主價值，民眾也認知會對民主造

成有害的結果，並增加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尤其，若認知是自己最不喜歡的政黨採取骯髒競選，上述的態度會更加強化。

除此之外，競選活動也是選民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機制，早期 Gelman 與 King (1993) 提出「啓發偏好理論」(theory of enlightened preferences)，認為民衆在競選期間，透過媒體資訊的傳遞，逐漸學習也熟悉政黨及候選人的相關訊息，除了強化對基本背景資訊的理解外，也包括在意識形態及重要議題上的立場。尤其，競選活動會提升民衆政治態度的好惡強度，形成「物以類聚」的效果，形塑出群內同質性與群間異質性的結果。也就是說，支持同一陣營的民衆會彼此凝聚，且在各項特質及態度上更趨一致，同時與敵對陣營群眾的態度差異愈趨明顯。

此一將競選活動視為民衆政治學習機制的觀點，在後續研究中逐漸被證實。Andersen 及其同僚 (2003, 2005) 分析 1990 年代英國國會選舉的競選活動，結果發現選民在選舉年的政治知識確實較非選舉年時來得高，且在選舉年以民衆的意識形態等基本變數來預測其政黨支持，要比非選舉年時的預測結果來得更佳，尤其接觸媒體程度愈強者，上述的發現更為明顯。再從競選的時程來看，隨著投票日的接近，選民在民意調查時，對黨性的回應更為快速，並更可能依其黨性及意識形態來決定投票意向 (Enns & Richman, 2013; Grant et al., 2010)。在臺灣的研究也發現，在競選期間，隨著投票日的到來，民衆的政黨認同對政治態度的形塑愈趨重要，不但對候選人情感好惡的影響力逐漸升高，也對總統施政滿意度有相同的影響趨勢 (蕭怡靖, 2017)。

顯見，競選期間，民衆處於啓發學習的階段，透過眾多資訊的匯流，形塑其政治態度與偏好。此時政黨及候選人積極透過各式的選戰策略，將政治資訊傳達給民衆，除了網路媒體的快速傳遞外，具特定政治立場媒體的渲染，並透過民衆自身的選擇性閱聽，自然容易提高民衆對所屬政黨的支持，以及對敵對政黨的厭惡。尤其，當負面競選被廣為採用時，更讓民衆對敵對政黨的厭惡度提升，進而強化民衆黨性的情感極化 (Iyengar et al., 2012)。而在選舉結束後，政治動員與媒體渲染逐漸退燒，選民的情緒也將逐漸平緩，Hernandez 等人 (2021) 分析 1996 至 2016 年 42 個國家在 99 次選舉的民調資料後證實，在選舉結束後，民衆對政黨的情感極化隨之減弱。不過，這樣的結果並非一概而論，因為若選舉結束後，各方都能理性接受選舉結果，自然有利於情緒的和緩，但若其中一方對於選舉結果難以接受，或是延續進入另一場政治競爭，民衆的對立情緒必然持續存在，如同讓選舉進入延長賽。

參、2018 年地方選舉與 2020 年總統選舉的選戰氛圍

本文探討臺灣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這兩次選舉的選戰氛圍存在相當大的差異。2016 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在諸多政策上引起社會極大爭議。例如勞工一例一休與軍公教年金改革，皆引起多數民眾的不滿（陳陸輝、俞振華，2021），而臺大校長聘任案，不僅導致三位教育部長下臺，也不利執政黨的聲望。另外，2018 年 9 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副主委發言不當風波、10 月臺鐵普悠瑪號在蘇澳車站重大事故，也對民進黨的施政帶來負面的評價。從「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的長期民調資料結果即顯示，民眾對蔡英文總統的施政滿意度從 2016 年上任後持續下滑，至 2018 年 12 月達到谷底，不滿意度高達六成以上，滿意的比例則僅兩成左右。¹

而民進黨施政不佳，讓在野的國民黨有攻擊的機會。尤其，韓國瑜參選高雄巿市長時所引領的「韓流」旋風，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等庶民語言，與反菁英等民粹主義的訴求，再加上其個人特質，不僅成功爭取多數高雄巿民支持，也帶起國民黨在該次選舉的整體氣勢（Batto, 2021）。此外，在國民黨及公民團體的領銜下，針對能源議題及同志婚姻等議題提出公民投票，並與 2018 年地方選舉同時舉行。在民進黨執政不佳，臺灣社會民情相對保守下，民進黨不僅在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重挫，縣市長席次從 13 席驟減至 6 席，在公民投票上，與民進黨立場一致的非核家園與同性婚姻的民法修訂，也遭到多數民意的否決，讓民進黨的聲勢跌入谷底。

但民進黨在 2018 年地方選舉敗選的低迷聲勢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 2019 年 1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紀念會上講到，「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基本方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好方式」。對此，蔡英文總統旋即回應表示「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根本原因就是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其實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臺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絕大多數臺灣民意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這樣的對立互動激起臺灣民眾在兩岸統獨上的情緒反應。同年 3 月，香港爆發「反

¹ 請參閱「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官網公布之總統滿意度趨勢圖，網址：http://teds.nccu.edu.tw/files/archive/263_ea8add4c.jpg。

送中」社會運動，眼見香港的自由民主逐漸被中國沒收，在「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語下，讓臺灣民衆感到焦慮，不僅引起臺灣網路輿情的升溫（黃紀等人，2021），也導致部分民衆心生「亡國感」的不安，同時升高對臺灣認同的情感（鄭夙芬、王德育，2021）。此外，2018 年下半年開始，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逐漸升溫，對抗中國成爲臺美共同的目標，不僅讓臺美雙邊關係更爲密切，在「亡國感」的憂慮下，也加強臺灣民衆「聯美抗中」的心理，並投射在對總統候選人的支持上（翁履中，2021）。

在上述的大環境下，讓民進黨在 2020 年總統選舉找到著力點，以「抗中保台」作爲選戰主軸，將蔡英文形塑爲抵抗中國壓力下的「辣台妹」，激起民衆在兩岸關係上的敏感神經，以爭取民衆的選票支持。反觀，在野的國民黨雖然提名勝選高雄市市長並引發「韓流」的韓國瑜參選總統，但黨內外的各項挑戰與批判卻逐漸耗損其政治能量。首先，韓國瑜上任高雄市市長後，率團出訪港澳並至「中聯辦」訪問，引發高度爭議，再加上上任後的若干爭議作爲或失言，讓反對韓國瑜的民衆對其貼上「草包」的標籤，並成立「公民割草行動」，以罷免韓國瑜作爲訴求。其次，國民黨內欲爭取 2020 年總統選舉提名者衆多，而韓國瑜在表態參與黨內總統提名初選後，不僅引起「落跑選總統」的負面批評，即便後來在初選民調勝出，正式獲得提名，也埋下黨內能否團結的隱憂。再者，罷韓團體在 2019 年 6 月底啓動第一階段的罷免提議簽署，並於 12 月底將第一階段的提議人名冊送交中選會，意味著在總統選舉期間，罷韓行動同時進行，對總統選舉的選戰氛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最終，民進黨不僅逆轉 2018 年地方選舉大敗的頹勢，蔡英文更以史上最高的 817 萬票勝選，連任成功。國民黨則耗盡 2018 年地方選舉勝選的氣勢與能量。但此時藍綠的對立並未隨著總統選舉落幕而緩和，因爲在選後第 6 天，中選會宣布罷免韓國瑜第一階段的提議通過，罷韓團體也在 1 月底啓動第二階段連署活動，讓總統選舉期間的政治動員與熱度延續下去。

這兩次全國性選舉除了上述選戰氛圍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本質差異在於 2018 年的地方選舉雖可視爲對執政黨的期中考，但當時國、民兩黨競爭衝突的議題或選戰主軸皆屬內政問題，與兩岸統獨或國家安全無關，且地方選舉結果並不會影響到中央執政權的更迭，相對不會挑起兩岸統獨的意識形態爭議。此外，時任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在選舉結果揭曉後，旋即在臉書上表示對人民不滿政府的施政感到抱歉，並已向總統口頭請辭，以負起政治責任，爲民進黨的慘敗尋求停損點，並試圖降低

民眾對民進黨的負面情緒。²反觀，2020年的總統選舉，由於選舉結果決定中央執政權的更迭，兩黨無不傾其全力高度動員，再加上兩岸統獨爭議及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皆激起臺灣民眾不安的「亡國感」，在最敏感的兩岸統獨爭議已被挑起的情形下，自然容易激起藍綠民眾的意識形態對立，強化民眾對敵對政黨的負面情緒。

尤其，即便總統選舉結束後，民進黨持續掌握中央執政權，但公民團體在選舉期間所發動的罷韓行動，在選後仍持續進行。而事實上這場罷韓行動在總統選舉期間即宣傳要讓韓國瑜落選總統，同時高雄市市長被罷免的「雙殺」結果。依據劉嘉薇（2022）的研究顯示，在罷免韓國瑜期間，網路上的民粹主義聲量明顯提高，而田弘華（2023）的研究也證實，政黨認同及動員對於是否投票支持罷免韓國瑜具有統計上顯著的直接與間接效果。這意味罷韓行動與總統選舉同時進行，且罷免的對象即是主要政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因此罷韓行動可視為總統選舉期間的重要事件，甚至是總統選舉期間各方陣營所採取的選戰策略，企圖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投票抉擇。尤其，罷韓行動不僅讓總統選戰的競爭熱度提高，更在選後持續推動，繼續激化選民的情緒對立。

依據過去文獻的學理討論與研究發現，再加上2018年與2020年實際的選舉氛圍後，作者推論出以下假設。首先，民眾在競選期間會提高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進而擴大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且在中央層級的總統選舉比地方層級的縣市市長選舉更為明顯。其次，競選期間所激起的政黨厭惡感，會在選舉結束後逐漸消退，但2020年總統選舉受到罷韓行動的影響，不僅在總統競選期間同時進行，並在選後持續推動，故不會減緩政黨厭惡感的差距，甚至會持續堆高。最後，民眾對於罷免韓國瑜的立場是否與所屬政黨一致，將影響政黨厭惡感差距的減緩或堆高。

肆、資料蒐集與變數測量

要瞭解民眾對政黨的負面情緒在競選期間及選舉結束後是否發生變化，雖然可以在前後兩個不同時間點，分別採取獨立抽樣的「橫斷面民意調查」（cross-sectional survey）進行比較分析，呈現出總體態度的變化。但此一方法並無法偵測具備哪些特徵的民眾發生態度變化，以及態度變化的細部流向，此時，採取「定群追蹤」的民意調查研究設計相對需要與適當。就如同Bartels（2006）所言，採取

² 賴清德於選舉結果揭曉的當晚向總統提出口頭請辭，但被總統慰留。直至2019年1月立法院通過行政院總預算後，賴清德再次向總統請辭，並獲准辭。

定群追蹤的民意調查設計，在分析競選效果上具三項優點，包括：有助於校正測量誤差、可直接觀察選民態度或行為決策的變化，以及可將競選時期發生的事件作為選民態度變化的解釋變數。

對此，本文對於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皆在競選期間以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 20 歲以上的成年人為調查母體，進行獨立抽樣，執行電話訪問，並於選舉結束後，針對選前已受訪的民衆再進行追蹤訪問，以瞭解同一群民衆在前後兩次訪問的態度變化。至於之所以選擇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來進行分析，主要是資料取得的考量，因為只有這兩次選舉有針對受訪者進行選前及選後的定群追蹤調查，並將政黨負面情緒納入測量。其中，2018 年地方選舉的投票日為 11 月 24 日，選前電話訪問為 10 月 9 日至 17 日，委由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民意及市場調查中心執行，總計完成 1,237 份有效樣本，再於選後的 12 月 3 日至 8 日，針對選前成功受訪民衆進行電話追蹤訪問，最後完成 643 份有效樣本，追蹤成功率為 52%。另外，2020 年總統選舉的投票日為 1 月 11 日，選前電話訪問為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20 日，委由異視行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計完成 1,529 份有效樣本，再於選後的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18 日，針對選前成功受訪民衆進行電話追蹤訪問，最後完成 830 份有效樣本，追蹤成功率為 54%。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定群追蹤勢必會遇到訪問失敗導致樣本流失的問題，但若樣本流失非隨機發生，會讓定群追蹤的成功樣本發生結構偏差。附錄表 A 的結果顯示，這兩次定群追蹤調查成功與否，確實在部分人口特徵與政治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在 2018 年追蹤成功的樣本相對偏向 40 歲以上、專科及以上學歷與國、民兩黨認同者；2020 年追蹤成功的樣本則偏向大學及以上、南部地區及國、民兩黨認同者。這也是本文在推論母體時必須注意到的限制。

在問卷設計上，由於臺灣自民主化以來，政黨競爭始終以國民黨及民進黨為主，期間雖有第三政黨的出現，卻皆無法長期穩定發展。再者，2018 年地方縣市長選舉除了臺北市市長外，各縣市的主要候選人皆由國、民兩黨所提名，2020 年總統選舉也是以國、民兩黨候選人為主。故本文對於民衆對政黨的厭惡感主要即以國、民兩黨為測量對象，問卷題目為「如果用 0 到 10 來表示一個政黨令人討厭的程度，0 表示『完全不令人討厭』，10 表示『非常令人討厭』，請問 0 到 10，您會給國民黨多少？那您會給民進黨多少？」。利用上述民衆給予兩黨厭惡感的選後數字減去選前數字，即可得知對政黨厭惡感的前後變動。另外，對於政黨厭惡感是否存在敵我政黨差距擴大的現象，則必須探詢民衆自身的政黨認同傾向，故兩次調

查中皆利用以下題組來進行測量，即「在目前國內的政黨中，請問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如果有明確回答認同的政黨，繼續追問「請問您支持的程度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通通？」，如果沒有明確回答認同的政黨，則進一步追問「那請問您有沒有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藉由此一題組不但可以建構出民衆政黨認同的方向，亦可探詢民衆認同的強弱程度，進而建構民衆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及變動。

伍、資料分析與結果詮釋

民衆在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對國、民兩黨的厭惡感，在選舉期間與選舉結束後的態度為何？表 1 顯示，在 2018 年地方選舉的競選期間，全體民衆對兩黨厭惡感的平均數都大於 5，表示民衆對這兩黨都感到厭惡，符合過去研究發現臺灣已出現反主流政黨的情緒（林聰吉、蕭怡靖，2021）。但其中，民衆對民進黨的厭惡感為 6.59，顯著高於對國民黨的 5.61，反映出在 2018 年的地方選舉期間，整體大環境對民進黨相對不利，更足以解釋為何民進黨在 2018 年地方選舉的結果遭遇重大挫敗。

由於競選期間政黨與候選人的選戰策略與動員，會激化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故進一步依據民衆的政黨認同來檢視對政黨厭惡感的差異。除了無政黨認同者對民進黨的厭惡感仍高於對國民黨外（6.84 vs. 6.02），國、民兩黨認同者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亦如預期顯著高於所屬政黨。國民黨認同者對民進黨厭惡感的平均數為 7.39，遠高於對所屬國民黨的 4.41；同樣的，民進黨認同者對國民黨的厭惡感達 6.60，也顯著高於對所屬民進黨的 5.00。但如果從對敵我政黨的差距來看（即對兩黨厭惡感的平均數相減後，再取絕對值），國民黨認同者的差距為 2.98，明顯高於民進黨認同者的 1.60，顯示在 2018 年選舉期間，國民黨認同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相對較高。這符合 2018 年選舉期間的政治氛圍及選舉結果，也凸顯當執政黨的施政表現不佳時，雖然所屬政黨認同者亦會對其存在厭惡感，但在野黨認同者對其厭惡感會更強烈。

上述民衆對兩黨厭惡感的差距，是否在選後會隨著選舉結束而消散？從表 1 的選後追蹤調查資料顯示，全體民衆對民進黨的厭惡感仍是相對較高的 6.56，顯著高於對國民黨的 5.67，且兩黨支持者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同樣顯著高於所屬政黨。但若以民衆對兩黨厭惡感在前後兩次調查的變動來看（如表 1 最下方橫欄所示），所有數據皆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也就是說，不管是全體民衆、無政黨認同者，

表 1

2018 年地方選舉民衆對國、民兩黨厭惡感的描述分析表

選舉期間	厭惡國民黨	厭惡民進黨	差距〔絕對值〕
全體民衆	5.61	6.59	0.98***
無政黨認同者	6.02	6.84	0.83***
國民黨認同者	4.41	7.39	2.98***
民進黨認同者	6.60	5.00	1.60***
選舉結束後	厭惡國民黨	厭惡民進黨	差距〔絕對值〕
全體民衆	5.67	6.56	0.89***
無政黨認同者	5.82	6.74	0.92***
國民黨認同者	4.47	7.18	2.71***
民進黨認同者	7.04	5.36	1.68***
變動 〔選後－選前〕	厭惡國民黨	厭惡民進黨	差距
全體民衆	0.06	-0.03	-0.08
無政黨認同者	-0.19	-0.10	0.09
國民黨認同者	0.06	-0.21	-0.27
民進黨認同者	0.44	0.36	0.08

註：差距採 T 檢定，*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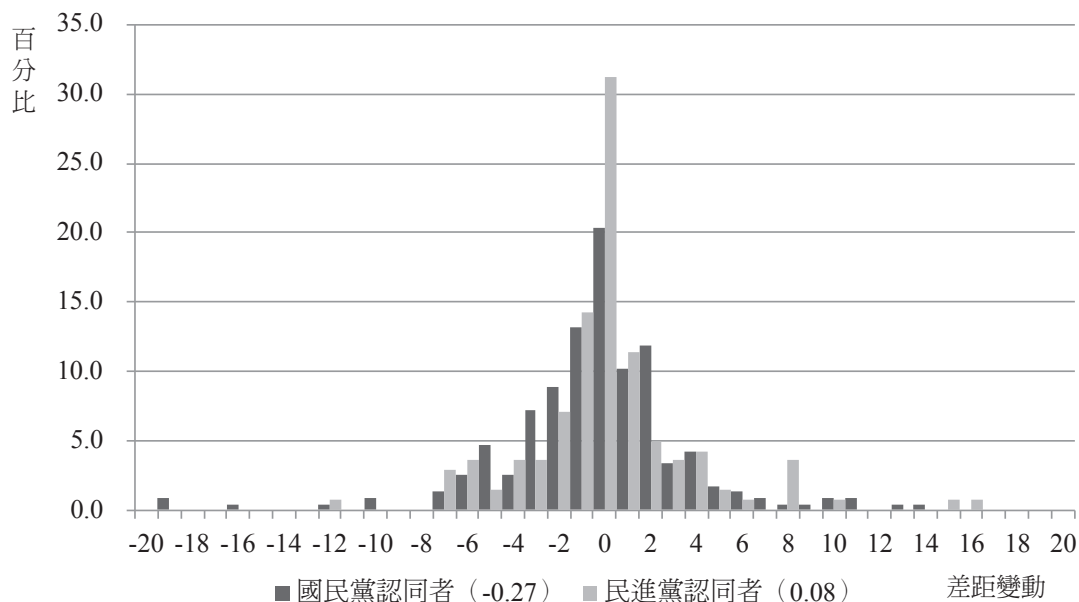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台灣民衆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還是國、民兩黨認同者，對國、民兩黨厭惡感的差距及變動皆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這結果並不符合本文預期選後民衆對政黨的厭惡感會出現消散的研究假設。

若進一步僅將國、民兩黨認同者納入，計算兩黨支持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變動，以選後差距（-10 至 10）減去選前差距（-10 至 10），形成 -20 至 20 的連續光譜。數字為正且愈大，表示在選後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擴大；反之，數字為負且愈小，表示在選後反而拉近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而圖 1 的橫軸表示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變動，直軸是所占百分比，圖例中括弧內的數字則是兩黨認同者變動的平均數。結果顯示，國、民兩黨認同者的變動幅度都相當有限，絕大多數都在正負 2 個單位以內（各占 65% 左右）。其中，國民黨認同者有超過兩成以上沒有差異，民進黨認同者更有超過三成完全沒有變動，再次顯示 2018 年地

方選舉並沒有引起民眾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波動。對此，作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地方選舉並未牽涉到中央執政權的更迭，相對也較不會激起民眾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對立。但亦有可能是因為選後的民意調查是在選舉結束後 10 日旋即進行訪問，而當時的選戰氛圍仍未消去，以致民眾仍存在競選期間的黨性情感對立，這有待未來利用更完整的研究設計進行檢證。

圖 1
2018 年地方選舉國、民兩黨認同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差距變動圖



資料來源：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若將情境轉換到影響中央執政權更迭，並碰觸兩岸統獨敏感議題的 2020 年總統選舉。表 2 呈現出與 2018 年地方選舉截然不同的結果，在競選期間的調查結果顯示，全體民眾對國、民兩黨的厭惡感皆在中間的 5 左右，雖然對國民黨的厭惡感稍高於對民進黨（5.07 vs. 4.94），但在統計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無政黨認同者則是對民進黨的厭惡感略高於對國民黨（5.21 vs. 4.82），但亦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不過，對國、民兩黨認同者而言，則出現預期的敵我差距。國民黨認同者對民進黨的厭惡感顯著高於對國民黨（6.46 vs. 4.04），差距為 2.42；民進黨認同者對國民黨的厭惡感也顯著高於對民進黨（5.70 vs. 3.84），但差距是較低的 1.86。

表 2

2020 年總統選舉民衆對國、民兩黨厭惡感的描述分析表

選前	厭惡國民黨	厭惡民進黨	差距〔絕對值〕
全體民衆	5.07	4.94	0.13
無政黨認同者	4.82	5.21	0.39
國民黨認同者	4.04	6.46	2.42***
民進黨認同者	5.70	3.84	1.86***
選後	厭惡國民黨	厭惡民進黨	差距〔絕對值〕
全體民衆	6.76	5.02	1.74***
無政黨認同者	6.30	5.27	1.03***
國民黨認同者	5.49	6.70	1.22**
民進黨認同者	7.63	3.97	3.65***
變動 〔選後－選前〕	厭惡國民黨	厭惡民進黨	差距
全體民衆	1.69***	0.08	1.62***
無政黨認同者	1.48***	0.06	1.42***
國民黨認同者	1.45***	0.25	-1.20*
民進黨認同者	1.93***	0.13	1.79***

註：差距採 T 檢定，*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資料來源：台灣民衆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這顯示在競選期間，國、民兩黨認同者存在顯著的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異，且在野的國民黨認同者比執政的民進黨認同者來得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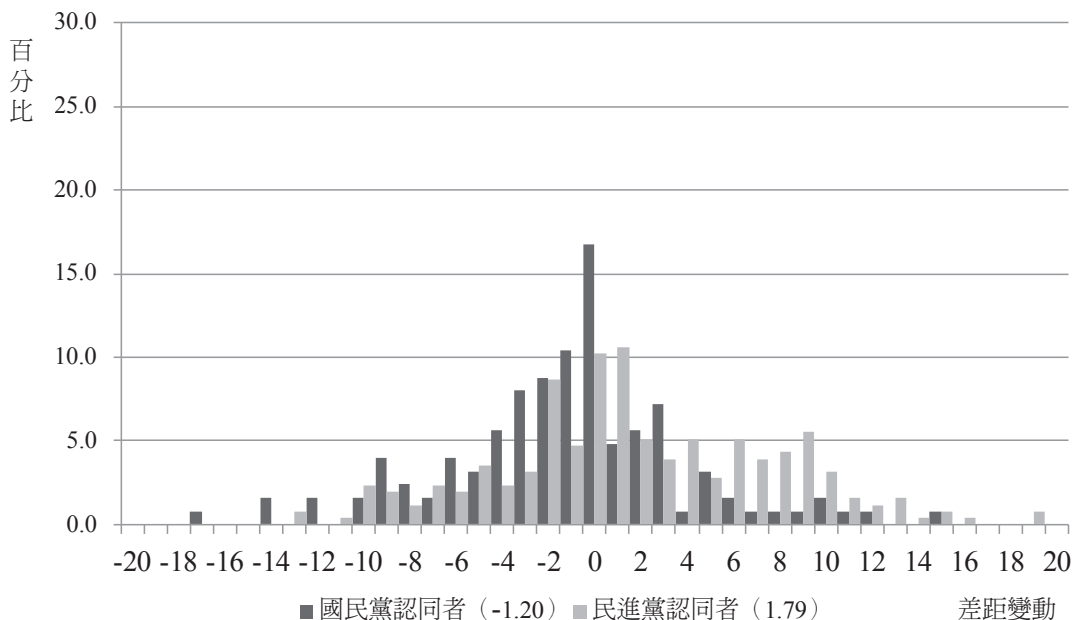
不過，在總統選舉結束後所進行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全體民衆對國民黨的厭惡感顯著高於對民進黨（6.76 vs. 5.02），差距達 1.74。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無政黨認同者身上，對國民黨的厭惡感為 6.30，顯著高於對民進黨的 5.27，差距為 1.03。至於對國、民兩黨認同者而言，則出現值得關注的變化，雖然整體依舊是存在「褒我貶他」的預期現象，但對兩黨褒貶的差距，則出現兩黨互換的結果。在競選期間國民黨認同者有較大的差距，但在選舉結束後則轉變成民進黨認同者存在較大的差距。

在選後，國民黨認同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是 1.22，民進黨認同者則高

達 3.65，之所以有如此劇烈的轉變，最主要是民眾對國民黨的厭惡感，不分黨性全面提升。從表 2 最下方的橫列數據顯示，全體民眾對國民黨的厭惡感顯著增加 1.69，對民進黨則沒有顯著變化，故對兩黨厭惡感的差距顯著增加 1.62。而這樣的趨勢，同樣發生在無政黨認同者及國、民兩黨認同者身上，只是民進黨認同者對國民黨的厭惡感增加 1.93 幅度最高，且對兩黨厭惡感變動的差距也是最大的 1.79。這表示民進黨認同者擴大心理層面的藍綠情感對立是因為「貶他」，而國民黨認同者則是因為「貶我」而拉近藍綠情感對立。

圖 2 比照圖 1 的計算方式，建構出國、民兩黨認同者在前後兩次民調中，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變動。就整體平均數而言，民進黨認同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在選後擴大 1.79，而國民黨認同者則縮小 1.20，一來一往，呈現完全相反的趨勢。再者，民進黨認同者多數分布在大於 0 的右側正值，占 56.3%，顯示有過半認同者在選後拉大了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呈現黨性情感極化的趨勢；反觀，國民黨認同者的分布多在小於 0 的左側負值，占 53.6%，表示有過半的認同者在選後縮小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抑制黨性的情感極化。

圖 2
2020 年總統選舉國、民兩黨認同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差距變動圖



資料來源：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爲何選後民衆會不分藍綠提高對國民黨的厭惡感，如同本文前述針對 2020 年總統選舉整體選戰的說明，除了兩岸統獨爭議、香港反送中運動引發臺灣內部的「亡國感」外，韓國瑜在當選高雄市市長後投入總統選舉也引起許多負面攻擊，甚至罷韓行動在總統選舉期間同時進行，皆不利國民黨的選情。在此情境下，不僅強化民進黨認同者對國民黨的厭惡感，也提升國民黨認同者對所屬政黨的不滿。至於哪些因素會導致民衆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拉大，接續將建構統計模型來進行檢證。在統計模型中，依變數與圖 2 相同，以 -20 至 20 的連續變數，呈現國、民兩黨認同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變動，數值愈大，表示對敵我政黨的厭惡感差距愈拉大，故採取「多元線性迴歸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來進行分析。

在自變數部分，依據過去的學理討論，將民衆的政治涉入、政黨認同、統獨立場及是否支持罷免韓國瑜納入，同時也將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等人口變項作爲控制變數納入模型。將政治涉入與政黨認同納入，主要是因爲過去 Abramowitz（2010）的研究即顯示，政治涉入較高的民衆，在意識形態光譜上會朝向光譜兩極移動，且意識形態立場與黨性之間的連結也愈緊密。尤其，政治涉入愈高、黨性愈強的民衆，在對敵我政黨的情感溫度計差異上，也存在愈明顯的情感極化現象（Abramowitz & Webster, 2016; Iyengar et al., 2012; Iyengar & Westwood, 2015; 蕭怡靖，2014）。

而將民衆是否具有強烈的統獨立場及是否支持罷免韓國瑜納入模型，主要是融入該次選舉的實際政治競爭及選戰氛圍。過去研究顯示，臺灣主要政黨在統獨議題上的立場涇渭分明，是臺灣長期以來最主要的政治分歧（Sheng & Liao, 2017），也最能足以檢測臺灣政黨的極化程度（蕭怡靖、鄭夙芬，2014）。尤其，在總統或立委選舉期間，政黨或候選人時常利用敏感的兩岸統獨議題來進行政治操作，藉此動員選民、激起選戰對立，進而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Hsieh & Niou, 1996; Niou & Paolino, 2003; Tsai, 2008; Wang, 2001; 王鼎銘，2003；盛杏媛，2002；盛杏媛、陳義彥，2003），而該次總統選舉，兩岸關係也確實再度成爲選戰的焦點（方淇、吳重禮，2021）。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在統獨議題上已有既定立場的民衆（包括支持統一或獨立），在該次選舉觸動緊張的兩岸關係與統獨爭議的敏感神經下，會強化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

另外，如前所述，公民團體不僅在總統選舉期間發動罷韓行動，更在總統選舉結束後，持續推動第二階段的罷免連署，讓藍綠對立的激情在選後繼續延燒。由於韓國瑜是國民黨提名候選人，支持罷免韓國瑜的民衆自然將矛頭指向國民黨，提

高對國民黨的厭惡感。而發起罷免韓國瑜的公民團體，其立場與民進黨相對一致，故反對罷免韓國瑜的民眾則會提高對民進黨的厭惡感。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支持罷免韓國瑜對提高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在國、民兩黨認同者身上會有不同的效果。在民進黨認同者身上會有加重的效果，因為課責敵對政黨，進而擴大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反觀對國民黨認同者而言，因為課責所屬政黨，故會減緩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為此，模型中除了置入政黨認同與是否支持罷免韓國瑜外，也同時置入兩變數的「交互作用項」（interaction term）來進行檢證。各項變數的問卷測量語句及變數處理方式的說明，請參閱附錄表 B。

在表 3 未置入交互作用項的模型一結果顯示，有明確統獨立場的民眾（包括主張獨立或統一），相較於主張維持現狀的民眾，在選後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確實顯著增加 2.035 個單位，符合本文的預期假設。但政治選舉新聞關注度及政黨認同強度的影響力，雖然在模型中的係數方向與預期一致，但並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模型中僅納入國、民兩黨認同者，而這些有政黨認同的民眾原本對政治選舉新聞的關注本來就相對較高，弱化了此一變數的影響力。此外，政黨認同的強弱度也與是否具有統獨立場，及是否支持罷免韓國瑜存在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且在當時聚焦在兩岸統獨爭議及罷韓活動的政治氛圍下，政黨認同強弱度的影響力相對容易被稀釋。

至於支持罷免韓國瑜相對於反對罷免韓國瑜的民眾，在選後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顯著增加 2.508 個單位，但如前所述，這影響力並非一視同仁，必須依據民眾的政黨認同而定。在將支持罷免韓國瑜與認同民進黨的交互作用項置入模型後（如模型二），交互作用項的係數為正值的 11.175，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意味著支持罷免韓國瑜對提高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在民進黨認同者身上顯著增強。此外，在加入交互作用項後，認同民進黨與支持罷免韓國瑜的係數各自皆為顯著負值（-4.785 及 -3.622），這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當國民黨認同者支持罷免韓國瑜時，會比反對罷免韓國瑜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拉近 3.622 個單位；同理，當民進黨認同者反對罷免韓國瑜時，也會比支持罷免韓國瑜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拉近 4.785 個單位。

為了讓上述的交互作用結果有更直觀的解釋，接續將迴歸方程式中的各項自變數條件固定後，³檢視支持或反對罷免韓國瑜的態度，在國民黨與民進黨認同者身

³ 將迴歸方程式的其他自變數設定為「注意政治選舉新聞」、「普通或偏向」認同國民黨或民進黨政黨、「支持兩岸統一或臺灣獨立」、「男性」、「40至59歲」以及「高中職專科」學歷者。

表 3

國、民兩黨認同者對敵我政黨厭惡感差距變動之迴歸分析表

	模型一		模型二	
	β	(S.E.)	β	(S.E.)
常數	-2.733	(1.438)	-0.078	(1.392)
注意政治選舉新聞 (不注意=0)	0.212	(0.808)	0.218	(0.752)
認同民進黨 (認同國民黨=0)	1.131	(0.867)	-4.785***	(1.173)
強烈政黨認同 (普通或偏向=0)	0.697	(0.705)	-0.049	(0.665)
支持統一或獨立 (維持現狀=0)	2.035**	(0.660)	1.564*	(0.618)
支持罷免韓國瑜 (反對=0)	2.508**	(0.845)	-3.622**	(1.181)
支持罷免韓國瑜×認同民進黨	-----	-----	11.175***	(1.607)
男性 (女性=0)	-0.811	(0.662)	-0.736	(0.616)
年齡層 (20~39 歲=0)				
40~59 歲	-0.129	(0.831)	-0.293	(0.774)
60 歲以上	0.076	(0.958)	-0.283	(0.893)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0)				
高中職及專科	0.190	(1.039)	-0.225	(0.969)
大學及以上	0.844	(1.091)	0.174	(1.020)
模型資訊				
n	317		317	
F-value	4.237		8.846	
p-value	< 0.001		< 0.001	
Adjusted- R ²	0.093		0.215	

註 1：依變項為國、民兩黨認同者在前後兩次訪問中，對敵我兩黨厭惡感的差距變動（-20~20），數字為正且愈大，表示在選後對敵我政黨的厭惡感差距擴大；反之，數字為負且愈小，表示差距縮小。

註 2：***表 $p < 0.001$ ；**表 $p < 0.01$ ；*表 $p < 0.05$ 。

資料來源：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上，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變動情形。表 4 顯示，在設定其他自變數固定的條件下，同樣支持罷免韓國瑜，但在國、民兩黨認同者身上呈現截然不同的結果。當

支持罷免韓國瑜是民進黨認同者時，在選後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會拉大 3.22 個單位，但如果是國民黨認同者，差距反而會縮小 3.17 個單位；同理，當反對罷免韓國瑜是國民黨認同者時，在選後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會拉大 0.45 個單位（在統計檢定上並沒有顯著的變動），但如果是民進黨認同者時，差距反而會縮小 4.34 個單位。這驗證了本文的預期假設，即支持罷免與否的影響力要視政黨認同的對象而定，如果與自身所屬政黨的立場一致，會更拉大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但如果與所屬政黨的立場相左，則在心理相互矛盾下，會縮小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與總統選舉同時進行的罷韓行動，可視為競選期間的重要事件或競選策略，而上述的分析結果也證實，在總統選舉結束後持續推動的第二階段連署，確實延續藍綠競爭對立的氛圍。不過，是否持續堆高民眾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則需視對罷韓行動的支持與否而定。這樣的發現不僅證實競選活動對民眾政治態度的影響，且即便總統選舉結束，延續下來的活動仍舊持續影響民眾對政黨的情緒。

表 4
政黨認同與支持罷韓與否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變動

	認同民進黨	認同國民黨
支持罷免韓國瑜	3.217 (1.751~4.683)	-3.173 (-5.516~-0.829)
反對罷免韓國瑜	-4.336 (-6.704~-1.967)	0.450 (-1.380~2.280)

註：細格中括弧內的數字為 95% 信心水準下的信賴區間。

資料來源：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陸、結論

臺灣自 2000 年以來，國、民兩黨的競爭衝突愈演愈烈，除了兩黨在統獨議題上分占光譜兩端外，民眾對於政黨的情感好惡也出現極化的態勢。其中，公職人員選舉是政黨競爭最重要的場域，政黨及候選人為求勝選，會採取各種競選策略，並

透過媒體及人際網絡進行宣傳與動員。而民衆對敵我政黨的情感對立是否因此被激化？尤其是否提升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對此，本文以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爲背景，利用定群追蹤的民意調查資料，分別在競選期間及選舉結束後，針對同一群受訪者進行調查訪問，測量民衆在選舉前後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是否發生變化？且在總統選舉對政黨的厭惡感差距是否比地方選舉來得明顯？同時探索導致對敵我政黨厭惡感差距擴大的影響因素。

研究發現，在兩次選舉中，雖然民衆對政黨的厭惡感會受到政黨當時的表現良窳而有差異，例如在 2018 年地方選舉，民進黨在選前執政表現不佳，導致整體民衆對民進黨的厭惡感高於國民黨；反觀，在 2020 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因爲兩岸局勢及候選人爭議的影響，導致整體民衆對國民黨的厭惡感高於民進黨。但若僅從國、民兩黨認同者來看，確實存在褒我貶他、涇渭分明的藍綠區隔，對敵對政黨的厭惡感皆顯著高於所屬政黨。至於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是否會因爲政治競選而被激化？在 2018 年地方選舉中，並未出現上述的預期結果，但在 2020 年總統選舉則有不同的發現，因爲罷免韓國瑜行動不僅在選舉期間同時進行，並在選舉結束後持續推動，以致整體民衆對國民黨的厭惡感顯著提升，進而強化對兩黨厭惡感的差距。

透過統計模型的建構即發現，總統選舉結束後，民衆是否支持罷免韓國瑜，對敵我政黨的厭惡感存在顯著的影響力，並與自身的政黨認同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當民進黨認同者支持罷免韓國瑜，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加乘提升，但若反對罷免韓國瑜，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卻反向縮減；相反的，國民黨認同者若反對罷免韓國瑜，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略微增加，但若支持罷免韓國瑜，則對敵我政黨厭惡感的差距明顯降低。此外，在兩岸統獨議題上有明確立場的民衆（無論支持統一或獨立），相對於支持維持現狀的選民，在選後對敵我政黨的厭惡感差距顯著增加，顯示在總統選舉期間，統獨議題的動員確實足以激化國、民兩黨認同者的情感對立。

藉由本文的研究發現，更能理解政治競選除了對民衆的投票抉擇可能產生影響外，也可能激化民衆對政黨的情感對立，但此一效果除了因爲選舉層級而有差異外，也須視當時的選戰氛圍及議題而定。雖然這種情感極化的效果並未發生在所有層級的公職人員選舉，也未發生在所有特質的選民身上，但仍對以選舉爲運作核心的民主體制提出一項警訊。即選舉只是民主政治決定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組成，或決定重大政策方向的一項制度，如能讓民衆在經過激情的選舉後，仍保有理性溝通與互動，才能有助民主政治運作的穩定及品質的提升。

本文雖然利用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在競選期間與選舉結束後進行定群追蹤調查，測量並比較政治競選對政黨厭惡感的影響效果，也獲得上述的研究發現。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發現是否得以推論至其他選舉，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最主要是 2020 年總統選舉的競選氛圍不同於以往，除了該次選舉受到香港社會運動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外，更有公民團體在競選期間針對總統候選人提出罷免案。由於參選人與被罷免者的角色重疊，讓罷免行動成為總統選舉的重要事件或參選陣營的競選策略，甚至在選舉結束後持續推動，都讓該次總統選舉的影響效果存在獨特性。

此外，在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上，本文仍有以下限制。首先，本研究在兩次選舉的追蹤調查時間點並不一致，雖然競選期間的調查皆是在投票日前一個月左右進行，但地方選舉的選後調查是投票日後 10 天進行，總統選舉則是在投票日後 30 天進行，兩次選後調查的時間點不一致，再加上總統選舉期間即已展開並持續直至選後的罷免韓國瑜活動，皆讓兩次選舉的比較存在干擾因素。其次，競選期間與選後各一次的調查，只能知道選舉前後態度的變與不變，但若能在選舉尚未展開前，先針對民眾的態度進行「基準調查」（benchmark survey），接續於選舉期間採取「滾動式橫斷面調查」（rolling cross-sectional survey），最後於投票結束後進行定群追蹤，將可獲得更完整的態度趨勢變化。再者，本文採取定群追蹤的研究方法，無法避免會因樣本流失而導致結構偏差的問題，以致在推論母體上產生若干的限制。最後，就因果推論而言，若能採取「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的方法，在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釐清民眾的態度變化，是否受到競選刺激（treatment）的影響，將會讓研究發現更為精準有效，也是未來可進一步探究的方向。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靖興（2019）。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Wang, C.-H. (2019). *The panel study of 2020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Yushan Young Fellow Program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王鼎銘（2003）。政策認同下的投票效用與選擇：空間投票理論在不同選舉制度間的比較。選舉研究，10（1），171-206。[Wang, D.-M. (2003). Voting utility and choice decision in 2001 ele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voting theory in different electoral system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0(1), 171-206.]
- 方淇、吳重禮（2021）。兩岸關係對 2016 年和 2020 年總統選舉的影響。載於陳陸輝（編），2020 年總統選舉：新時代的開端（頁 145-177）。五南。[Fang, C., & Wu, C.-L. (2021). The impa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he 2016 and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L.-H. Chen (Ed.),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pp. 145-177). Wu-Nan Book Inc.]
- 田弘華（2023）。罷免投票行為的理性選擇分析：以 2020 年高雄市長罷免案為例。選舉研究，30（2），1-44。[Tien, H.-H. (2023). Rational choice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in the 2020 Kaohsiung mayoral recal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30(2), 1-44.]
- 李弘繹、張佑宗（2022）。負面黨性與投票抉擇：2004-2020 年臺灣總統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29（2），35-72。[Lee, H.-I., & Chang, Y.-T. (2022).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voting choice: The cas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aiwan, 2004-2020.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9(2), 35-72.]
- 林聰吉、蕭怡靖（2021）。人格特質與政黨情感好惡差距。選舉研究，28（2），1-46。[Lin, T.-J., & Hsiao, Y.-C. (2021).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artisan affect differenc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8(2), 1-46.]
- 翁履中（2021）。台美關係與 2020 年總統選舉：初探大選中的美國因素。載於陳陸輝（編），2020 年總統選舉：新時代的開端（頁 179-209）。五南。[Weng, L.-C. (2021). Taiwan-U.S. relations a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American factor in the election. In L.-H. Chen (Ed.),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pp. 179-209). Wu-Nan Book Inc.]
- 莊淑媚、洪永泰（2011）。特定政黨不認同：台灣地區民意調查中關於政黨認同的新測量工具。選舉研究，18（2），1-29。[Chuang, S.-M., & Hung, Y.-T. (2011). A study of negative identification against a specific party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8(2), 1-29.]

- 黃紀、郭子靖、洪國智（2021）。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對台灣網路輿情的影響。載於陳陸輝（編），**2020年總統選舉：新時代的開端**（頁211-222）。五南。[Huang, C., Kuo, T.-C., & Hung, K.-C. (2021). The impact of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in 2019 on Taiwan's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L.-H. Chen (Ed.),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pp. 211-222). Wu-Nan Book Inc.]
- 黃秀端（2004）。政黨輪替前後的立法院內投票結盟。**選舉研究**，**11**（1），1-32。[Hawang, S.-D. (2004). A comparison of voting coali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before and after party turnover of the year 2000.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1*(1), 1-32.]
- 盛杏媛（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〇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9**（1），41-80。[Sheng, S.-Y. (2002). The issue Taiwan independence vs. 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 An analysis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9*(1), 41-80.]
- 盛杏媛（2008）。如何評估選制變遷對區域立委的代表角色與行為的影響：研究方法的探討。載於黃紀、游清鑫（編），**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頁223-249）。五南。[Sheng, S.-Y. (2008). How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electoral system on the representative role and behavior of district legislators: A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C. Huang & C.-H. Yu (Eds.), *How to assess the change of electoral system: A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pp.223-249). Wu-Nan Book Inc.]
- 盛杏媛、陳義彥（2003）。政治分歧與政黨競爭：二〇〇一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10**（1），7-40。[Sheng, S.-Y., & Chen, Y.-Y. (2003). Political cleavage and party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of the 2001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0*(1), 7-40.]
- 陳陸輝、俞振華（2021）。2020年總統選舉的回顧與影響。載於陳陸輝（編），**2020年總統選舉：新時代的開端**（頁1-17）。五南。[Chen, L.-H., & Yu, C.-H. (2021). Review and impact of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L.-H. Chen (Ed.),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pp.1-17). Wu-Nan Book Inc.]
- 鄭夙芬、王德育（2021）。威脅下的台灣認同與2020年總統選舉。載於陳陸輝（編），**2020年總統選舉：新時代的開端**（頁45-66）。五南。[Cheng, S.-F., & Wang, T.-Y. (2021). Taiwanese identity under threat a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L.-H. Chen (Ed.),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pp.45-66). Wu-Nan Book Inc.]
- 劉嘉薇（2022）。民粹主義在臺灣？網路大數據分析。**台灣政治學刊**，**26**（2），65-126。[Liu, J.-W. (2022). Populism in Taiwan? Big data analysis of the internet.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6*(2), 65-126.]

- 蕭怡靖 (2014)。從政黨情感溫度計解析台灣民衆的政治極化。《選舉研究》，21 (2)，1-42。
[Hsiao, Y.-C. (2014).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aiwan: An analysis on mass feeling thermometer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2), 1-42.]
- 蕭怡靖 (2017)。競選期間選民對候選人評價的變化：以 2012 年台灣總統選舉為例。《選舉研究》，24 (2)，1-38。[Hsiao, Y.-C. (2017). Change in voters' candidate evaluation during a political campaign: A case study of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4(2), 1-38.]
- 蕭怡靖 (2018)。台灣民衆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 (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行政院科技部。[Hsiao, Y.-C. (2018). *The electoral cycle of people's political attitudes in Taiwan* (Project number: MOST 107-2410-H-032-051-MY2).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蕭怡靖 (2019)。台灣民衆的黨性極化及其對民主態度的影響。《台灣政治學刊》，23 (2)，41-85。[Hsiao, Y.-C. (2019). The people's partisan polar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2), 41-85.]
- 蕭怡靖、鄭夙芬 (2014)。台灣民衆對左右意識型態的認知：以統獨議題取代左右意識型態檢測台灣的政黨極化。《台灣政治學刊》，18 (2)，79-138。[Hsiao, Y.-C., & Cheng, S.-F. (2014).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the left-right ideology in Taiwan: Replacing left-right ideology with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to measure Taiwan's party polarization.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2), 79-138.]

二、英文部分

- Abramowitz, A. I. (2010). *The disappearing center: Engaged citizens, polariz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bramowitz, A. I. (2011). The 2008 election: Polarization continues. In R. G. Niemi, H. F. Weisberg & D. C. Kimball (Eds.),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5th ed., pp. 297-308). CQ Press.
- Abramowitz, A. I., & McCoy, J. (2019). United States: Racial resentment,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polarization in Trump's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1(1), 137-156.
- Abramowitz, A. I., & Saunders, K. L. (2008). Is polarization a myth? *Journal of Politics*, 70(2), 542-555.

- Abramowitz, A. I., & Webster, S. (2016). The rise of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U.S. elec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Electoral Studies*, 41(1), 12-22.
- Abramowitz, A. I., & Webster, S. (2018). Negative partisanship: Why Americans dislike parties but behave like rabid partisans. *Political Psychology*, 39(1), 119-135.
- Andersen, R. (2003). Do newspapers enlighten preferences? Personal ideology, party choice, and the electoral cycle: The United Kingdom, 1992-1997.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3), 601-619.
- Andersen, R., Tilley, J., & Heath, A. F. (2005).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enlightened preference: Party choice through the electoral cyc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2), 285-302.
- Anderson, C. D., McGregor, R. M., & Stephenson, L. B. (2022). Us versus them: Do the rules of the game encourage negative partisanship?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61(4), 1060-1079.
- Bankert, A. (2021). Negative and positive partisanship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43(4), 1467-1485.
- Bankert, A. (2022a). Negative partisanship among independents in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78, 102490.
- Bankert, A. (2022b). The personality origi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partisanship.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10(4), 299-310.
- Bartels, L. M. (2006). Three virtues of panel data for the analysis of campaign effects. In H. E. Brady & R. Johnston (Eds.), *Capturing campaign effects* (pp. 134-163).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assan-Nygate, L., & Weiss, C. M. (2022). Part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hap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natural and survey experiments in Israe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5(2), 287-318.
- Batto, N. F. (2021). The impact of Han Kuo-yu's populist rhetoric in the 2018 Kaohsiung mayora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8(2), 47-94.
- Caruana, N. J., McGregor, R. M., & Stephenson, L. B. (2015). The power of the dark side: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771-789.
- Cassese, E. C. (2020). Dehumanization of the opposition in political campaign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01(1), 107-120.

- Cassese, E. C. (2021). Partisan dehuman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Political Behavior*, 43(1), 29-50.
- Enns, P. K., & Richman, B. (2013).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the fundamental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5(3), 803-820.
- Fiorina, M. P., & Levendusky, M. S. (2006). Disconnected: The political class versus the people. In P. S. Nivola & D. W. Brady (Eds.),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 (Volume one, pp. 49-117).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Fiorina, M. P., & Abrams, S. J. (2009). *Disconnect: The breakdown of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Fiorina, M. P., & Abrams, S. J. (2011). Where's the polarization? In R. G. Niemi, H. F. Weisberg & D. C. Kimball (Eds.),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5th ed., pp. 309-318). CQ Press.
- Fiorina, M. P., Abrams, S. J., & Pope, J. C. (2006).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3rd ed.). Longman.
- Fiorina, M. P., Abrams, S. J., & Pope, J. C. (2008).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Misconceptions and misreadings. *Journal of Politics*, 70(2), 556-560.
- Gelman, A., & King, G. (1993). Why ar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polls so variable when votes are so predictab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4), 409-451.
- Grant, J. T., Mockabee, S. T., & Monson, J. Q. (2010). Utah campaign effects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3(4), 811-821.
- Hansen, K. M., & Kosiara-Pedersen, K. (2017). How campaigns polarize the electorat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s an effect of the minimal effect theory within a multi-party system. *Party Politics*, 23(3), 181-192.
- Hernandez, E., Anduiza, E., & Rico, G. (2021). Affective polarization and the salience of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69(1), 102203.
- Hetherington, M. J. (2009). Putting polarization in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2), 413-448.
- Hetherington, M. J. (2011). Resurgent mass partisanship: The role of elite polarization (updated). In R. G. Niemi, H. F. Weisberg & D. C. Kimball (Eds.),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5th ed., pp. 242-265). CQ Press.
- Hsiao, Y.-C., & Yu, C.-H. (2020). Polarizati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5(8), 1143-1162.

- Hsieh, F.-S., & Niou, M.-S. (1996). Salient issue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oral Studies*, 15(2), 219-230.
- Huang, C., & Kuo, T.-C. (2022). Actual and perceived polarization on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views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2(2), 75-92.
- Iyengar, S., Sood, G., & Lelkes, Y. (2012). Affect, not ideology: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6(3), 405-431.
- Iyengar, S., & Westwood, S. J. (2015). Fear and loathing across party lines: New evidence on group polar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3), 690-707.
- Iyengar, S., Lelkes, Y., Levendusky, M., Malhotra, N., & Westwood, S. J.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29-146.
- Kimball, D. C., & Gross, C. A. (2007). The growing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voters. In J. C. Green & D. J. Coffey (Eds.), *The state of the parties: The changing rol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arties* (5th ed., pp. 265-278). Rowman & Littlefield.
- Lee, S., Rojas, H., & Yamamoto, M. (2022). Social media, messaging apps,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5(5), 673-697.
- Lelkes, Y., Sood, G., & Iyengar, S. (2017). The hostile audience: The effect of access to broadband internet on partisan affe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1), 5-20.
- Levendusky, M. S., & Malhotra, N. (2016a). Does media coverage of partisan polarization affect polit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3(2), 283-301.
- Levendusky, M. S., & Malhotra, N. (2016b). (Mis) perceptions of partisan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0(S1), 378-391.
- Mason, L. (2015). 'I disrespectfully agre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tisan sorting on social and issue polar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1), 128-145.
- McCoy, J., Rahman, T., & Somer, M. (2018). Polarization and the global crisis of democracy: Common patterns, dynamics, and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for democratic politi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2(1), 16-42.
- McGregor, R. M., Caruana, N. J., & Stephenson, L. B. (2015). Negative partisanship in a multi-party system: The case of Canada.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5(3), 300-316.

- Medeiros, M., & Noël, A. (2014). The forgotten side of partisanship: Nega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four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7), 1022-1046.
- Niou, M.-S., & Paolino, P. (2003).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in Taiwan: Explaining Chen Shui-bian's victory i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Electoral Studies*, 22(4), 721-740.
- Reiter, F., & Matthes, J. (2022). How partisanship matters: A panel study on the democratic outcomes of perceived dirty campaigning.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10(4), 247-260.
- Ridge, H. M. (2022). Enemy mine: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Political Behavior*, 44(3), 1271-1295.
- Rodríguez, I., Santamaría, D., & Miller, L. (2022).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artisan affective polarisation in Spain.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27(1), 27-50.
- Rogowski, J. C., & Sutherland, J. L. (2016). How ideology fuels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38(2), 485-508.
- Schmitt-Beck, R., & Farrell, D. M. (2002). Do political campaigns matter? Yes, but it depends. In D. M. Farrell & R. Schmitt-Beck (Eds.), *Do political campaigns matter? Campaign effects in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pp. 183-193). Routledge Press.
- Sheng, S.-Y., & Liao, H.-C. (2017). Issue,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Taiwan. In C. H. Achen & T. Y. Wang (Eds.), *The Taiwan voter* (pp. 98-13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ingh, S. P., & Thornton, J. R. (2024). Does the salience of partisan competition increas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77(1), 45-58.
- Somer, M., & McCoy, J. (2018). Déjà vu polarization and endangered democracies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2(1), 3-15.
- Sood, G., & Iyengar, S. (2016). Coming to dislike your opponents: 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political campaign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www.ssrn.com/abstract=2840225>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2nd ed., pp. 7-24). Nelson-Hall Publisher.
- Tsai, C.-H. (2008). Making sense of issue position, party image, party preference, and voting choice: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2004 legislative elec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20(1), 1-24.
- Walder, M., & Strijbis, O. (2022). Nega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use of party cues in the direct democratic context.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10(4), 325-335.

- Wang, D.-M. (2001). The impacts of policy issues on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 A mixed logit approach.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8(2), 95-123.
- Webster, S. W. (2018). It's personal: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negative partisan affect in polarized U.S. politic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2(1), 127-145.
- Webster, S. W., & Abramowitz, A. I. (2017).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S.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5(4), 621-647.
- Yarchi, M., Baden, C., & Kligler-Vilenchik, N. (2020).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he digital sphere: A cross-platform, over-time analysis of interactional, positional,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on social me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8(1-2), 98-139.
- Yu, C.-H., & Hsiao, Y.-C. (2021).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aiwan*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2021 APSA Annual Conference (CGOTS), September 28-October 3, Seattle.

附錄

表 A

定群追蹤成功與否在人口結構及政治態度上的差異檢定

	2018 年			2020 年		
	成功	失敗	卡方檢定	成功	失敗	卡方檢定
性別						
男性	49.9	48.7	$X^2=0.199$	52.9	48.5	$X^2=2.931$
女性	50.1	51.3	$p > 0.05$	47.1	51.5	$p > 0.05$
年齡層						
20 至 29 歲	8.9	16.1	$X^2=20.908$ $P < 0.001$	7.9	9.3	$X^2=3.788$ $p > 0.05$
30 至 39 歲	13.9	17.5		16.0	14.7	
40 至 49 歲	29.2	23.2		22.9	19.4	
50 至 59 歲	24.6	22.6		22.6	24.5	
60 歲以上	23.4	20.6		30.5	32.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5.3	6.8	$X^2=17.435$ $P < 0.01$	5.2	7.4	$X^2=10.731$ $P < 0.05$
國（初）中	5.3	9.5		8.1	9.9	
高中（職）	27.3	28.0		33.2	36.0	
專科	17.5	11.0		14.4	15.0	
大學及以上	44.6	44.7		39.1	31.7	
地理區域						
北北基	34.8	33.3	$X^2=6.839$ $p > 0.05$	27.6	34.8	$X^2=39.231$ $P < 0.001$
桃竹苗	13.9	17.8		14.2	16.2	
中彰投	17.9	16.6		19.4	18.9	
雲嘉南	13.9	15.1		18.1	10.4	
高屏澎	15.7	15.1		18.1	13.4	
宜花東	3.8	2.0		2.7	6.3	
政黨認同						
國民黨	37.5	30.3	$X^2=26.435$ $P < 0.001$	18.3	15.3	$X^2=17.466$ $P < 0.001$
民進黨	23.3	16.2		35.1	27.8	
中立與其他	39.2	53.5		46.3	56.9	

資料來源：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表 B

各變數測量語句與資料處理說明

變數	問卷題目內容	編碼方式
對國民黨兩黨的厭惡感	如果用 0 到 10 來表示一個政黨令人討厭的程度，0 表示「完全不令人討厭」，10 表示「非常令人討厭」。請問 0 到 10，您會給國民黨多少？您會給民進黨多少？	1. 將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2. 將受訪者對兩題回答的數字相減計算出差距。 3. 將選後差距減去選前差距，即得出變動結果。
政黨認同	1. 在目前國內的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若明確回答，續問 2a；若未明確回答，則續問 2b〕 2a. 請問您支持的程度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通通？ 2b. 那請問您有沒有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	1. 認同對象歸類為「國民黨」、「民進黨」、「其他黨」及「中立無反應」。 2. 「其他政黨」樣本數偏低且屬性多元，故並未納入分析。 3. 認同強弱度歸類為「非常支持」、「普通支持」及「偏向」。
統獨立場	關於臺灣和大陸的關係，有下面幾種不同的看法：1.儘快統一 2.儘快宣布獨立 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6.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將「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及「永遠維持現狀」歸類為「維持現狀」；其餘四類歸併為「支持統一或獨立」。「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是否支持罷免韓國瑜	高雄市有民眾和團體正在推動罷免韓國瑜市長，請問您支不支持高雄市民眾罷免韓國瑜市長？	「有點支持」、「非常支持」歸類為「支持」；「不太支持」、「非常不支持」歸類為「不支持」。「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對政治選舉的注意程度	請問您平時對於政治或選舉方面的新聞注不注意？	「完全不注意」、「不太注意」歸類為「不注意」；「非常注意」、「有點注意」歸類為「注意」。「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性別	受訪者的性別？	1 為男性，0 為女性。

表 B (續)

變數	問卷題目內容	編碼方式
年齡	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的？	重新歸類為「20 至 39 歲」、「40 至 59 歲」以及「60 歲以上」三分類。「拒答」設為遺漏值。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重新歸類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與專科」及「大學及以上」三分類。「拒答」設為遺漏值。

資料來源：台灣民衆政治態度的選舉循環（編號：MOST 107-2410-H-032-051-MY2），蕭怡靖，2018，行政院科技部；2020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追蹤調查，王靖興，2019，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和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Changes in Citizen's Avers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During and After Elec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2018 Local Elections a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Yi-ching Hsiao**

Abstract

Since 2000, Taiwan has witnessed continuous competition between pan-blue and pan-green political parties, which has stirred up an emotional confrontation among the public regarding partisanship. Indubitably, the election of public officia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rena for party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win the electi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will adopt various electoral campaign strategies, as well as dissemination and mobilization through the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s. Does the citizen's emotional antagonism between their own party and the opposing party intensify in the elections? In particular, does the public's aversion to the rival political parties escalate as a result? In this paper, we will use Taiwan's 2018 local elections and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s the background in utilizing the panel study of telephone interviews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people's avers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nsification effect of avers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only exists substantially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ereas the local elections lacked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avers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In additi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vers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is mainly induced by the significant issues and events during the election

*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yching@nccu.edu.tw

period including attitudes towards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of cross-strait and the recalling of Mayor Han Kuo-yu.

Keywords: avers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al campaig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panel study